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

宋国友

[内容提要] 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手段和结果,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经济相互依赖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非自由主义色彩。权力和安全等要素渗透到两国的经济交往中。此外,中美之间还面临着台湾等现实问题的极大制约。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未必会导致和平。

[关键词] 经济相互依赖 中美关系 战略限度

[作者简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研究。

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此种相互依赖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国内学者的判断大多是积极的,即经济相互依赖构成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有学者甚至据此认为两国必然选择“经济相互依赖和平”。但本文认为,对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战略后果不可过分乐观,必须充分考虑其战略限度。

一、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经济相互依赖

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经济相互依赖战略后果的判断。已有的回答大都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与此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中美经济显著的互补性使相互依赖自然形成。简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市场力量是塑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动因。

根据这种观点,中美经济关系较少甚至没有受到国家的介入,基本上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处于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中国和美国,对于因为资源重新配置而产生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多地是适应,而无力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会不

同程度地提升两国各自的经济福利,中美两国政府会欣然接受。

如果仔细考察中美关系发展历史,人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及市场力量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但中美之间可能成为对手的特殊性以及美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大影响,使得市场的塑造作用存在较大局限。仅举两例说明:其一,最惠国待遇(MFN)。按照自由主义取向的市场解释路径,美国无条件地给予中国MFN是应有之义,可众所周知,该问题恰恰成为上世纪整个90年代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问题;其二,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中国获得PNTR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根据国际贸易一般理论,中国入世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以及美国经济福利提升,但这个问题同样由于政治因素的卷入而一波三折。

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最终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固然有经济利得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华战略。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着较大分歧。经过长时间的辩论,

唐小松:“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战略互需及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第36-39页。

接触战略取代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遏制政策相比,接触战略不仅有助于中国在美国所关心的地区安全、人权以及不扩散等问题上取得进展,而且能够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克林顿本人对此曾有清晰表述。他在要求国会给予中国 PNTR 的信中表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促进“美国安全与中国改革的根本利益。通过把中国融入太平洋和全球经济,将会增加中国在和平和稳定方面的利益。在中国内部,也有助于发展法制”。美国学者评价中美经济关系,也都没有考虑双边经济的互补因素,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美国接触战略目标的实现为衡量标准。例如,易明坚持美国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并不是因为这样有利于两国经济,而是其认定接触战略通过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激起中国国内的政治自由化、法制改革以及媒体开放,进而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

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更好地实现接触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这直接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对待中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采取遏制战略,中美之间目前的经济相互依赖将不可能产生。

事实上,从国际关系理论看,把经济相互依赖看成国家实现外交目标手段的著作并不鲜见。赫契曼就曾主张经济相互依赖是国家用以胁迫他国的手段,“如果 A 国想增加对 B 国、C 国和 D 国等国家的控制 (hold), A 国将会制造一种处境,在这种处境里,其他国家为了维持和 A 国的贸易不得不做任何事情。”基欧汉和奈在著名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书中,大致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如果认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的分析就不能简单地采用“自由主义式”的“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主义属性

作为对华接触战略的产物,中美之间的经济相

互依赖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权力和安全等要素渗透于两国经济交往之中。

从权力属性看,这是一种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的来源”。美国正是凭借自己作为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一方而获得某种权力,并对中国产生种种影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衡量。

第一,双边贸易。在美国初步决定对华采取接触战略的 1994 年,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1.81%,美中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4.09%,美中贸易额占美国 GDP 比重为 0.68%;中国方面的相应数据分别为 32%、20.3% 和 8.25%。到 2006 年,美国上述指标的相应数据是 5.32%、11.9% 和 2.74%,而中国的相应指标为 29.7%、19.4% 和 13.1%。中美在双边贸易方面的显著不对称由此可见。

第二,对对方的直接投资。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一直是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 2000 年之前,中国对美投资尚未起步。2006 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额为 28.7 亿美元。到该年为止,美国对华实际投资总额为 539.6 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资总额的 7.7%。同期,中国对美投资不到 4 亿美元,对美投资总额 12 亿美元左右,这一流量和存量的数据在美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均不到

Bill Clinton,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Permanent Normal Trade Status for China," March 8, 2000.

Elizabeth C. Economy, "Don't Break the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4, pp. 96 - 109. 关于制度改变论的观点,还可参见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17.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 Company, 1989.

关于经济相互依赖产生和平的观点,可参见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 - 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une 1997, pp. 267 - 294; Edwar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得出。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商务部。

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金融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在该指标上中美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平衡。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甚至以“金融恐怖平衡”来形容——中国帮助美国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美国为中国提供巨额贸易顺差。但数据显示,中美在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也是非常不对称的。首先,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累计9061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增加额为9006亿美元,这意味着对美贸易顺差其实是 中国外汇储备剧增的决定性来源。其次,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共购买了289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9061亿美元)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数量的三倍多。最后,截止2006年,中国共购买了349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只占美国国债总额86802亿美元的4%,这一比重很难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更谈不上对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上述三个典型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上的不对称性相当明显,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两国并未形成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美国因此占有了不对称而带来的权力。

从安全属性分析,这是一种彼此防范的经济相互依赖。基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美国限制了那些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中美经贸往来形式,力图把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控制在与国家安全无关的领域。即使这样有损自身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也继续执行。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相互依赖截然不同于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

第一,美对华实施出口控制。美国国会在“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提出了多项旨在强化和监控对华技术出口的规定。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在美国出口管理局的出口控制名单中属于要特别严格控制和详细审查的一类,同时也是审查时间最长的国家。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提出进一步加强 对华出口管制,在对原来的出口限制清单进行稍微调整后,增加了47项军民两用产品或技术,其中包括强力雷达、高性能计算机和可以用于反坦克武器升级的贫铀等。美国助理商务部长帕迪拉

(Christopher A. Padilla)直言不讳,声称此举是为了保障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军事利益。2007年3月,美国ITT公司由于违反了《武器出口控制法案》,在未获许可证的情况下,把美军使用的夜视镜技术“非法提供给中国的承包商”,进而“危害国家及战场上美军的安全”,被罚款1亿美元。这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类似案件罚金数额的最高记录。在严格的对华出口控制下,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要远低于从中国的进口。2006年,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总额为176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却高达727亿美元。美国对华实施出口控制,从经济角度而言,加剧了本国对华贸易逆差,不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对美国而言,国家安全的考虑超过了经济利益。“无论何时经济利益与军事安全发生矛盾,美国本能地会倾向于选择后者”。

第二,美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FDI)。由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连创历史记录,外国对美FDI可以有效改善其国际收支,因此意义尤为重大。但即便如此,美国仍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严格审查来自中国的FDI。美国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90年。当时,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希望购买美国飞机零部件制造商MAMCO公司,但老布什总统根据“埃克森-弗罗里奥”(Exon-Florio)条款,否决了该项交易。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美国总统正式否决的交易。近几年,随着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增多,美国负责审查外国对美投资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US)更是加强了对各项交易的调查。从2003年到2005年,共有6项外国对美FDI遭到CFUS的调查,其中有2项涉及中国,其一

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得出。数据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和中国商务部。

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源自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外汇储备数据源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及美国国债总额源自美国财政部数据。

James Jochum, “Testimony for the Hearing before the U. S. - 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an 17, 2002.

“管制清单扩充至47项,美要加强对华高科技出口控制”,《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1月31日。

“美国防务公司对华出口夜视技术遭亿美元重罚”,《环球时报》,2007年3月29日。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Peter Peterson and Jack Sebenius,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Agenda,” in Graham Allison ed.,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Norton, 1992, p. 58.

为香港和黄公司收购美国环球电讯 (Global Crossing), 其二为联想电脑收购 IBM 个人电脑部。在巨大压力下, 中海油公司甚至没有等到 CFUS 的调查便被迫放弃了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事实上, 美国主要以国家性质为标准审查对美 FDI, 而非根据交易本身。受此影响, 到 2005 年, 中国对美国 FDI 总额不过 10 亿美元, 涉及 900 个左右的项目, 每个项目平均金额略微超过 100 万美元。中国使用巨额外汇储备对美投资的主要方式也因此被限定在购买美国的各种债券, 如国债、政府机构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

不过, 在美国看来, 中国对美经济政策也具有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浓重保护主义色彩。2007 年 2 月, 中国国资委宣布国有资本将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 7 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 这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很大反弹。

由此可见, 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笼统而言已经较深, 但大都不属于敏感范畴。在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和战略领域, 两国不仅没有形成依赖, 而且彼此防范和排斥。

三、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制约

除了特别指出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现实主义特征外, 本文还将剖析那些严重制约经济相互依赖和平作用发挥的中美政治现实, 以更为充分地说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战略限度。

第一, 致命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发挥和平作用的最大现实制约。在该问题上, 中美双方的政策和立场存在着严重分歧, 甚至是冲突。

在中国看来, 台湾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 2005 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明确规定,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衡量上, 主权完整要超过经济利益,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台湾对于美国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美国始终把台湾看成其军事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两岸统一、现状维持以及台湾独立的三个选项中, 美国最为偏好最后一个, 只是鉴于台湾独立可能引发不可控制的军事风险, 美国才选择了“现状维持”的双重约束政策。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在宣示两岸不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时, 强调的现状是美方定义的现状, 既包括两岸分离的现状, 也包括台湾尚未获得法理独立、不具备主权身份的事实。这表明, 美国不会反对台湾实质性的独立, 而是反对台湾正式的、法理的独立, 反对的是那些具有高度象征性、宣示性、同时又对大陆具有极大刺激性的“台独”举措。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战略目标存在显著差异, 中方希望的是最终统一, 而美方更希望台海实际的分离状态乃至独立, 所以目前台海局势的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将来必然和平。换言之,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 都必然面临因台湾问题而造成的瓶颈。台湾问题将会是中美之间的最大“冲突引爆点”。此外, 不得不指出, 台湾问题出现的本身就是对“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观点的重大挑战。目前, 中国大陆不仅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且是其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但就是在此情况下, 台湾当局并没有因为两岸间的深度经济相互依赖而放弃“台独”政策。这给台海局势的和平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数。以此为参照, 怎么可以认定经济相互依赖就一定可以导致中美之间的和平?

第二, 美国国内政治的激烈反弹。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对美国国内不同经济行为体的收益并不均等, 有些经济行为体会因为对华经济关系的增长而获益并成为赢家, 而有些会因此受损而沦为输家。作为一个选举社会, 美国政府必须对其国内政

Edward Graham and David Marchick,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e, 2006, p. 101.

中苏之间的分裂很好地说明了此点。关于中国对苏外交中的主权完整和经济利益的衡量, 可参见沈志华和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吴心伯:“台湾问题: 中美互动的新常态”, 《国际问题研究》, 2006 年第 5 期, 第 11 页。

治的变化做出反应。

总体而言,在中美扩大经贸往来的初期,中美经济关系的受益者要远远多于损失者。但是近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赢家”的增长幅度相对放缓。对华投资工商业集团以及大型跨国公司是经济层面对华接触战略的重要获益者和支持者,但近几年它们对中国的投资显著下降。无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如何,从影响而言,这表明将来对华自由经济关系支持力量将会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的深化在美国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输家。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巨额对华贸易逆差上。美国近年对华贸易逆差连创记录,2006年更是达到2325亿美元,约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1/3。美国不少人把对华逆差和失业增加直接联系起来,造成美国国内对于中美贸易的不满者大为增加。

赢家和输家的力量消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美国国内政治反弹,将会导致两个可能的结果。其一,打断中美经贸往来的正常发展,进而弱化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美国政府为了平息国内对中美贸易的批评,会采取措施限制中美自由贸易的开展。这在民主党上台后的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调整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二,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外溢至“高级政治”领域,危害两国政治及安全关系。贸易不仅仅只有和平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为了经济利益的实现,政府可能使用政治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对中国而言,16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就是惨痛的回忆。

第三,“外部动力”的可能衰减。“外部因素”一直是推动建交后中美合作关系形成的突出动因。它在冷战期间表现为苏联的威胁;如今表现为美国所进行的反恐战争及其后续。小布什上台伊始,曾明确宣称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只是“9·11事件”的发生迫使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调整,恐怖主义被认定为最危险的敌人。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反恐战争。其后,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的相继爆发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然而,无论时间长短,上述问题总归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解决。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能否形成足以维系两国关系中合作与稳定的内部动力?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外部因素”在维护中美合作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并务实地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该概念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中国已经认识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可能重新调整并相应地做了准备。美国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常青不衰”。在美国看来,共同价值观才是确保中美关系常青不衰的最终动力。在中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两国关于价值观问题的争执乃至冲突难以避免。

四、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调整 与中国的应对

中美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经济相互依赖不仅表现出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而且受到各种政治现实的严重制约,因此其和平作用的发挥大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就中美关系的现状而言,美国处于强势一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形成更多地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结果而非原因,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对华战略走向将决定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两手准备一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在军事上对华加强防范。具体措施有坚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积极提升美台军事关系,深化同东亚军事盟国的合作以及压制和抨击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种种正常努力。可以预见,这种对华军事战略短时间内不会被轻易改变。另一方面,美国对华在经济领域“试错性”地实施接触战略,在获得经济利

2002 - 2006年,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分别为54.2亿美元、41.9亿美元、30.6亿美元和28.6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统计。

Katherine Barbieri and Jack Levy,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387 - 404.

杨毅:“坚持和平发展,维持战略机遇期”,《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第40页。

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http://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5/Sep/22-769678.html>

益的同时,看其能否最终塑造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也正是因为处于这种等待最终结果的过程中,两国关系才处于和平的状态。

但问题是,美国不会永远等待下去。在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之前,美国必定会对该战略进行重新评估。评估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两国通过经贸交往,都获得了绝对收益的提升,但中国从中所获得的相对收益是否要大大超过美国?第二,中国是否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两者的答案都为否定,那么接触战略会得以延续,甚至会更为宽松;如果答案皆为肯定,它将面临紧缩,甚至被终止。

美国仍在观察,但正失去耐心。就第一个因素而言,美国认为其通过接触战略获得的相对收益要少于中国,而确保相对收益的占优是美国继续推行接触战略的前提。卡普兰对此曾警告,华盛顿在推行经济接触的战略过程中“必须使其对中国的相对收益损失最小化”,为实现该目标,美国的正确做法是“在减少中国相对收益的同时,不损害其绝对收益”。然而,美国认为十多年来的对华经济接触使得中国经济实力得到迅速增加——该阶段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而美国自身经济增长速度却远不及中国。不仅如此,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也在缓慢地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这意味着长此以往,美国将丧失因为经济相互依赖优势而带来的权力。美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005年9月,佐利克直接就经济平衡问题警告中国,“中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若不加强合作并作为利益相关的参与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分担责任,美国就将无法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也无法保证美国国内对这个体系的支持”。作为警告的实际表现,美国政府近期开始频频在经贸领域对华提出种种限制措施以维护美国经济利益。

除了相对收益实际受损外,美国也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朝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点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衡量。从国内层面看,美国原先预期对华推行接触战略不仅会使得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而且能让中国政治实现“民主”。不过有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和大家所称的“自由民主”

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非常微弱,或者会变得更为微弱”。华盛顿宣称全球化和市场资本的传播不可避免会给中国带来西方式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在国际层面,美国希望中国会巩固和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体系。但萨特教授认为,中国最近与美国在战略上的合作以及目前在国际体系的表现更多地是“基于机会/成本衡量的策略性调整”,当中国强大之后,将会在东亚与美国的利益和影响进行竞争,这种竞争更多地是表现在地缘经济层面,“当中国获得东亚地区的领导权时,美国将实行战略上的撤退”。季北慈也宣称,“从许多方面看,中国成功的外交策略和推动‘新安全观’的举动可以被视为北京为在该地区提出一种可与华盛顿的安全框架相对应的另一类安全体系”。学者的研究得到了美国高级官员的回应,美国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曾数次强调,“我们不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我们期望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我们认为中国某些方面的政策或行为正在削弱双方在本地区和全世界维护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共同目标”。他给出的建议是,“我们需要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以防中国最终走的道路不符合我国利益”。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确定。两国关系还处于不断调整 and 变化中,美国对华战略完全可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Future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37 - 338.

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重大案例有:2007年2月初,美国就中国的补贴向WTO提起磋商请求;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初裁对中国铜版纸存在政府补贴,并征收反补贴税;4月初,美国将知识产权保护争议提交WTO。上述措施都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首次,以往不曾出现过。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Oct 2005, pp. 77 - 87.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p. 80, 17.

Bates Gill, “China's Growth as a Regional Economic Power: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presented before the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Dec. 4, 2003,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3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31204bios/batsgill.htm.

柯庆生:“美外交关系现状”,2007年2月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p=pubs-chinese&y=2007&m=February&x=20070307154842ibnij4213678>

能发生逆转。中国必须对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两面性及中美关系的冲突性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认为美国一定愿意或者不得不维持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厢情愿地认定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为共生关系,并且认为这种所谓的“共生关系”必然确保两国之间的和平,只能说明乐观的“已然”希望已经代替了对“已然”的冷静分析了。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逻辑支撑,而且在政策上会导致很大的危害。

最后回到中国对经济相互依赖所应采取的态度。第一,美国把经济相互依赖作为“接触”中国的政策手段,但中国不能因此就对其加以拒绝或抵制。事实上,中国从经济相互依赖所获得的收益,无论是以绝对指标还是以相对指标衡量,都要超过美国。

(接第53页)和学校建设投入等情况下更是如此。第四,即使国际组织普遍谴责美国暴行、国际与美国国内舆论同情阿富汗人民,美国也不可能轻易撤军。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乔姆斯基曾指出,美国不会理会国际法、国际法院、联合国及其他机构;世界舆论和美国内舆论也很难约束华盛顿。第五,北约盟军在阿富汗的成败事关北约转型的前途。如果在阿富汗的行动最终取得成功,北约便能以此为样板继续“跨出防区”,在其他地区进行“复制”。否则,北约未来的存在与行动模式将面临新的考验,前途难料。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北约成员国都希望尽最大努力来保证阿富汗行动的成功。

因此,塔利班与美国都不可能退让。但是,战场的拼杀与胜负不能决定阿富汗的未来。最伟大的力量蕴藏在人民中间,只有阿富汗人自己才能长期巩固民主与现代化进程。如果国内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公民社会,人民普遍贫困且缺乏希望,未来的阿富汗仍将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保护国。这样,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治根基就不可能被完全清除,虽然美国可以使塔利班在军事上遭受重创,但塔利班总有后续力量不断地补充上来。

在这种困境中,卡尔扎伊的中央政府在寻找另一条道路:试图通过妥协来求得和平,甚至考虑如果

中国是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最大获益者。第二,经济相互依赖是有代价的。美国必定会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压迫中国在某些领域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要维护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即使面临压力和苛责,也不应该首先打破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除非涉及台湾等直接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第三,经济相互依赖帮助中国崛起,但中国的真正崛起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假如中国强大到在各方面都足以“和平地”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时,美国是否就会“和平地”正视甚或满足中国的正当要求?答案并不肯定。冲突并非中国所乐见,但冲突如果在所难免,中国就应有所准备。

(责任编辑:张浩)

塔利班放下枪支,可以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卡尔扎伊认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同,后者是个有着全球计划的恐怖组织,而塔利班尽管激进,却是阿富汗社会的一部分,代表着相当部分的阿富汗人,应该得到与基地组织不同的对待与考量。2007年1月29日,卡尔扎伊表示愿意与塔利班及其他反政府组织进行和平谈判。此前,卡尔扎伊也曾向塔利班和其他一些被视为“温和派”的反政府组织递出过橄榄枝,卡尔扎伊政府还颁布过对塔利班武装人员的特赦令。起初,这些妥协行动并未得到政府官员的理解,然而,在军事打击效果不彰的情况下,很多政府官员也逐渐倾向于和谈。2007年5月9日,阿富汗议会通过决议,愿意与塔利班代表就其放弃武力的条件进行谈判。

然而,由于阿富汗中央政府的羸弱,也由于塔利班的固执以及西方的反对,可能的妥协之路也将是荆棘密布。如果此路不通,阿富汗未来局势当不会好于伊拉克。

(责任编辑:黄丽梅)

[美] 诺姆·乔姆斯基著,张鲲、郎丽璇译:《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Abubakar Siddique: "Afghanistan: The Government Seeks Stability Via Dialogue with Enemies," May 5, 2007, A EurasiaNet Commentary,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51007_sht1